

专题

← (上接3版)

途径,而非目的。

—

中国人对印谱的研究,大约是从宋代宣和年间开始的。印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和收藏鉴赏的价值。今人研究印谱,大可于方寸之中,领略篆文的字体以及印文的排列疏密、参差、错综的美感;也可驰目于毫厘之外,去感受古人的思虑通审,以及各种流派的不同篆刻风范。从明清到当代,有人嗜好收集,有人喜欢临摹古代印章,有人讲究考证学术,目的不同,出发点也就不尽相同。篆刻家和收藏家将留存下来的印章荟萃成谱,而流传至今,除了继承艺术传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供考证印人的流派。

中学毕业后,林先生常到曾荣光老师府上学习篆刻书法。最初,他每周按时到老师家听篆刻理论课,或者观察老师如何操刀。老师为他布置作业,下节课即修改点评。林先生的篆刻初学黄土陵,体会其中的气韵和美感,后又临摹赵之谦、吴让之等人,从上世纪60年代到如今,林先生所刻的印章居然达千余方之多。

曾先生带他走访了不少香港地区有名的收藏家,以此开拓眼界,打破停滞不前的关口。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老师带他到某位收藏家家中看一部很著名的印谱,但去了三次,都无功而返,因为那位收藏家对他们只说印谱找不到了,而林先生却无意间瞥见那部印谱就在桌下。经过这件事情,曾先生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印谱不宜私藏,应为大众所用。曾先生也因此将毕生所集藏印谱全部转赠于他,希望他日后继续收集流落坊间的印谱,成立一间印谱资料室,让所有的篆刻爱好者都能共享资源,也给相关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一处治学之地,免得他们为找资料而四处碰壁。这是曾先生对他的期望。林先生后来所做的种种亦是恩师之嘱,就连他所写文章的署名也作“天舒”,那是他将老师的笔名“楚天舒”去掉前面一个“楚”字。当然,林先生一脉相承的除老师的笔名外,还有老师的勤奋与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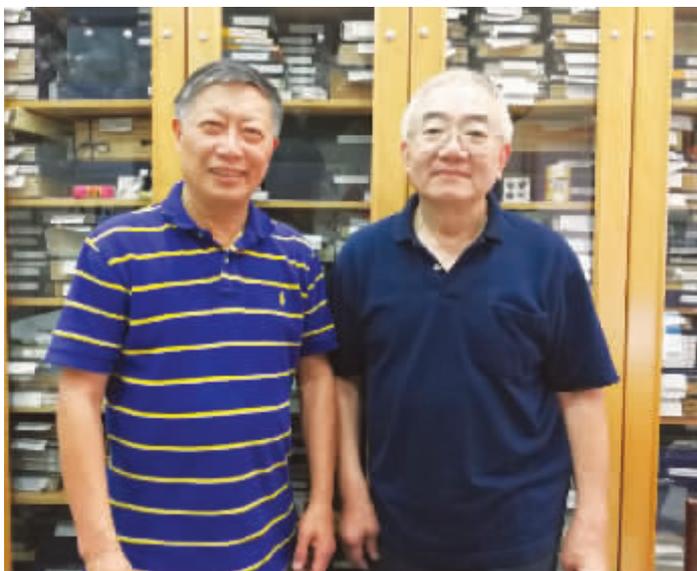
随着林先生的收藏数量递增,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这使他对印谱的版本有了新的认

识。一些重要的印谱,在流传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版本,每种版本所收印章又有数量上的不同。印谱的版本复杂,如西泠八家的印谱就有很多版本,需仔细判断、区别。像汪启淑辑的《飞鸿堂印谱》,内分不同年份的铃印,或有汪启淑像及释文,或无汪启淑像及释文;有的卷数一样,但所收印却多寡不同。而无释文的要早于有释文的。再如《求是斋印稿》四卷,四册,乃道光时黄鹄篆刻并辑,有的本子题“古闽黄鹄朗村氏篆”,蓝框,有手绘黄鹄像,原铃本有印释文。但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又有雕板印为绿框者,黄像也改为雕版,释文亦为摹刻,所以印谱也有版本之别。

序和跋中的文字,对于印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至于艺术篆刻的技巧,提笔奏刀,可反映出印人不同的精神面貌,诸如:苍劲雄放,自成一家数者;道丽流畅,疏逸自然者;挺健平正,不假修饰者;敦厚园秀,英健正雅者多有呈现。历来印人之原印,人们所见甚少,或无可得见,但印谱中多为原印铃拓,后人可以参考对比,也可仿刻学习。

林先生所藏的印谱除了老师的赠与,新增添的部分得自国内,据他估计,存世的印谱约在6000种左右,分散在世界各地,林先生收藏的就有2000余种。至于日本、韩国,也藏有将近2000部之多的印谱。当年香港的集古斋、中华书局,有了新的印谱就会通知他去买,此外,包括上海、天津、广州的古籍书店都和林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善于思考,是智者的特质之一。林先生前几年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印谱有效地为研究者所利用,那就是建成一个数据资料库。他开始将印谱中的信息一字不漏地敲进电脑里,有些信息可以在原书中找到,但大部分的数据是要经过查证和考据的,需要花费一天、数天,甚至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确切的信息。林先生设有自己的博客,博客名为“天舒的博客”。博客中每一小段文字,都可能是他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翻了很久,或在网上百般寻觅,然后结合材料写出来的。林先生对印谱的查证特别仔细,为的是避免因误判而引后人入歧途。尤其是对于一些使用同一斋名的作者,做这类的查证更是谨慎。查明资料以后,要把整本印谱一张张地扫描,而后录入谱名、卷数、篆刻者、页数、序、跋,再加上篆刻者的小传。这是一个繁琐且工作量很大的工程,耗时、



沈津(左)与林章松合影

耗力,所以林先生每天睡眠仅四、五个小时,平时只有在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情况下才会休息一会。这项工作,林先生日复一日,居然做了二十年。

印谱真正见于公家藏书目录著录的很少,讲印谱的著作则更少。前人对古铜印章并不重视,认为仅是雕虫小技,故藏书家亦不重视。甚至《四库全书》存目中收录印谱也甚少,仅存明代杭州人来行学刊刻的《宣和集古印史》八卷、明代吴县人徐官撰《古今印史》一卷、明代上海人顾以德撰《印藪》六卷、明代松江人何通撰《印史》五卷、明末胡正言撰《印存初集》二卷、《印存玄览》二卷。私家书目中涉及印谱的著录则更是十不一二。叶铭《金石书目》未附传世印谱,虽然有150多种,然而多半是后人的铃印本,与古铜印谱并列,而且仅著书目,撰写得很简略。

林先生对印谱最为敏感了。他费尽辛苦完成了《松荫轩藏印谱目录》,其中的罕见印谱,他是明察冰鉴、了然于心。家藏的700余种罕见印谱,深印于脑海。他除记谱名外,又对这700种印谱进行校对,曾在一年时间里校对了230多种印谱,写成37万字。四年前,国内某图书馆委托林先生将该馆所藏印谱目录加以校对,因此他将以前所写的《松荫轩藏印谱目录》初稿核对改动,这一工程比重新写还巨大,涉及事项更多也更为广泛,在改动中更发现了以前记录及印人题跋的失误之处。

林先生收藏印谱不是为了保值,而是为了探讨印学发展史,并补充以往研究者的缺漏之处。印谱中的序跋如与某些历史记载值得商榷。其次,还可以补充和考证许多名人的表字、别号、生卒年、籍贯、

交友、书斋号等等,当然,这些都要细读印谱才能知悉。

传世印谱有数千种,然而林先生却重人之所轻,轻人之所重。当收藏界对不可多得的名谱趋之若鹜,而对小谱、残谱、伪印之谱不甚重视时,他却有自己的见解。比如在拍卖场合拍得一册表面上看还算完整的印谱,然而收到之后才发现没有任何序跋及边款记载,这样的情况于林先生而言亦是多见。他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刑侦专家一样,去找寻蛛丝马迹,翻阅有关资料。幸运的话,几天便能查证出答案,当然,他有时费数月之劳,仍是徒劳无功。几十年来,林先生已经配齐了十几部残谱,其中有一部印谱仅存上半部,而下半部,他从广东、上海分了三次才陆续凑齐,使之延津剑合,破镜重圆。

再如林先生收藏的小谱《三近草堂印草》,单看此谱名,鲜有人知,或对这部印谱不屑一顾,但若提起主人名号,便众所周知了。“三近草堂”主人原来是李上达(1885—1949),辽宁人,长居北京,字达之,号五湖,室名为三近草堂。他是金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同门中翘楚,也是湖社、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书画研究会成员。据说在收藏界中,要看李上达的画轻而易举,但要看李上达的印却很难,知道李上达有印谱存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这是林先生眼光独到之处。

除了残谱、小谱,林先生对伪印也有关注。有人问林先生是否参与某次拍卖,林先生说:此套印谱其实都是伪印为主,但要作为资料保存,就算是伪印,亦希望能保存全套,以便后来学者能看到全貌。林先生虽然也追求完美,却不苛求,残谱也好,伪印也罢,只要是对他人考察取证有用处,他都不遗余力地躬身为之。若

收藏印谱只为了保值,大可不必计较这些,但若为了保存先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查证史实,这却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金石藉人而传,人亦藉金石以名。篆刻始于祖龙,有印即有印人,所以印人自古有之,不过古时印人由于地位低微,被时人称为工匠,因而没留名史册,殊为可惜。为印人事迹作小传者,乃为传古人于不朽之善举。最早为清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收58人,附见5人。清乾隆间,汪启淑有《续印人传》八卷之作,收罗128人,较周多至一倍有奇。后又有叶铭辑《广印人传》十六卷,收1551人,上自元明,下迄同光,搜辑史传,旁参志乘,以及私家纪述,600年来,专门名家,不问存歿,悉著于录。如今,坊间所见当代辑录印人传之书也有所见,所载印人较之前人所载更为丰富,但存世印人之多,不胜枚举。除了开宗立派的名家以及有代表性的篆刻家外,一般名气稍弱的印人多被人们所遗忘,如:尹祚薰(及郎)、李相定(寇如)、李德(吉人)、孙贇(汉南)、倪品之(品芝)等等,很少有人还记得他们的生平。

林先生致力于为清代印人编写小传。若没有林先生的记载,可能许多优秀篆刻家,他们的姓名就将会永远归隐于古籍之中无人问津,稀有印谱所呈现出的众多不同侧面也将杳无可寻。而且林先生不去记载大家熟知的人物,他为之立传的都是鲜为人知以及被人遗忘的人物。那一方方硃红色的印痕,透过色彩古朴的硃泥、质地轻盈的纸张,向林先生传递着各自的命运,而制造它们的印人也因为林先生的著录而名垂青史。

林先生在寻找印人资料的过程中,总是要翻阅多省地方志、《艺文志》、《印人传》、《人物志》以及各类人物资料书,他意识到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寻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印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江苏一带印人的小传,可以有《江苏印人传》参考,但对友人所托查寻的某吴中印人,即便是殚精竭虑,也无从查证。且不说明清、民国时期的印人资料难以寻觅,就连有些近现代的印人资料也无从下手。所以林先生决心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印人资料都予以公开,免得前人资料湮灭,后人研究没根可寻,无源可考。

在多种印人小传中,林先